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五)

编辑部编译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历史与意志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ZEDONG'S THOUGHT-HISTORY AND WILL
BY PHILIP H. KIM, PH.D.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历史与意志

〔美〕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内部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历史与意志

MAOZEDONG SIXIANG DE ZHIXUE TOUSHI

[美]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3印张 290,000字

00.001—10,000册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085-4/C·6 内部发行 定价 6.50元

丛书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个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原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望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并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86年10月

第五辑编者的话

同《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已出版的前四辑相比，弗里德里克·韦克曼教授的这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历史与意志》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本书讨论的主题既不是毛泽东的理论观念本身，也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而是作者所谓的毛泽东的“知识环境”。

韦克曼教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对中国明清和近代的历史及思想史有较深的研究，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研究》等书曾在美国中国学者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或许正是这种一般外国学者难得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养，使他能涉足毛泽东研究领域时得以选择这种独特的视角。

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一种对人类理性思维和现实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理论体系，它既反映了世界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又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批判地汲取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凝聚着折射着各种进步思想观念的光华。要正确地理解这一思想，尤其是对她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确有必要对毛泽东的知识环境做一番透彻的考察，运用由一系列曾对毛泽东产生过种种影响的理论观念构成的一

组透镜,对其思想加以分离和解析,以利于揭示其内在结构和
发展规律。

在这方面,韦克曼教授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在本书中,他充
分运用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知
识,围绕历史与意志的矛盾这样一条基本线索,通过历史溯源和
横向比较,为毛泽东勾勒了一幅知识环境的画面。他的这种努
力展示了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思路,并提供了许多可供
参考的思想资料。因此,我们翻译出版此书,希望能帮助国内学
者更全面地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

但是,本书也存在明显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据作者本人介
绍,他之所以萌生研究毛泽东的知识环境的念头,是由于当时正
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令他震惊,感到“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
位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而国外学术界的种种解释
又不足以让他信服,于是便决心追根溯源,试图通过知识环境这
样一种大景深的透视探究“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个重大的学术课题,本
身无可非议。但由于主客观方面存在的不利条件,作者的研究视
野受到很大局限。从主观方面看,多年来,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
的研究始终存在一种倾向,即力求从思想史的角度,在毛泽东思
想的形成轨迹和深层结构中挖掘出必然导致“文革”的“心理定
势”或内在逻辑。韦克曼教授虽不满足于某些粗浅的解释,想通
过对毛泽东知识环境的剖析拓宽研究的视界,但或许是受某种
思维定式的束缚,他的基本意图仍旧是从毛泽东思想本身寻找
“文革”的理论根源,没有超脱出上述一般倾向的窠臼。更重要的
局限是在客观方面。本书出版于1973年。当时,令人眼花缭乱的
“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置身其中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周围发

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普遍把它当成社会主义革命深化的合规律性现象，误认为“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氛围中，根本不可能形成把“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来的科学认识。置身局外且处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外国学者，当然更难以窥透底蕴，把对“文革”理论根源的分析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样一个正确概念基础之上。应当说，这是历史进程本身给人们认识造成的障碍。我们不想因此而苛求作者。

但是，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在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的历史局限，毕竟会使本书在具体问题上广博的引证和独到的分析为之减色。我们在将近20年后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阅读本书时，更感觉到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继续革命理论”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重要性。

读者也许会发觉，作者在论述毛泽东的知识环境与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往往表现出很大的跳跃性或随意性，时而引证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见解，时而复述他在“文革”中的言论。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蒙太奇”手法，令人很难把握本书各方面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作者的基本思路。

根据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形成的初步印象，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由于作者没有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继续革命理论”这样一些毛泽东在晚年的理论失误加以区分，甚至把这种失误当成毛泽东思想本身或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才造成的。

今天人们看得很清楚，“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偏颇估计、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产生误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不

同构，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常发展轨道的产物。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很难找到“继续革命理论”的基因。但是，作者既然把“文革”的理论与实践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然面临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他看来“继续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不应是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在长达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又找不到有足够份量的证据。于是，唯一的办法是把探究的视野往前推，一直推到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实际上，韦克曼教授考察的知识环境主要正是毛泽东当时所接触的各种思潮。

毛泽东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青少年时期积累知识、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思想学说，甚至一度信奉过某些“主义”。这并不奇怪。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观念中，当然不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糟粕。如果对其做抽象的哲学分析和表面的比较，不难在其中发现某些与“继续革命理论”相通的东西。可以说，作者的视线之所以在所谓“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之间不断地跳跃闪回，正是为了揭示二者之间蛛丝马迹的因果联系。

但是，这样一种写法给人们造成的势必是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是一个早年接触过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观念，经过几十年的潜伏期，最终在“继续革命理论”中得到显现或回归的过程。在所谓“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或主要线索。

这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一，它的前提是否认毛泽东的思想在1920年完成了一次质的飞

跃，即在清理批判当时所受各种思想影响的基础上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这一决定性的思想转变，根本不可能对毛泽东此后几十年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其二，它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置于研究视野之外，而这一过程恰恰正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样一来，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经历中就出现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断层。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中出现这样一种断层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书中并未就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三，即使假定在毛泽东早年知识环境同“继续革命理论”之间存在某种藕断丝连的联系，那末，这种联系在几十年的断层时期采取什么表现形态、以何种方式维系着并发挥作用，这也是应当加以阐明的重要内容。但是，书中并未提供具体的文献资料和明确的分析论证，有的只是一些暗示和联想。这显然不充分。难怪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比较零散”，希望人们“自己能把这些知识的片断综合起来”。其四，如果认定“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主要是在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环境之中，随之产生的问题便是，这些长期潜伏的思想要素为什么偏偏会在60年代中后期才显现出来，而不在前此任何时期发作起来？显然，脱离对“文革”前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定条件的具体分析，单纯在思想史领域中寻根溯源，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指出本书基本思路中存在的缺陷，并非完全否定它的学术价值和其中蕴含的有见地的思想。对于这样一部涉及重大课题的学术著作，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自己的评价。只有在这种思想交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才可能逐步深化。我们在这里不揣冒昧，把编辑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初步看法陈述于此，

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本书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英文原版译出。书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凡有国内中文版本的，均以中文版本的文字为准进行核校，并只注中文版本出处；无中文版本或个别查不到中文版本出处的引文，仍注英文原版所注出处。对于书中文献史实的不准确之处，没有逐一以编译注的方式指出，希读者在阅读时注意。本书中译本为内部发行，引用书中文字务请核对原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工作，并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的通力协作。本书编审工作由石仲泉和张宁负责。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施肇域（前言，第2、3、5章，第4、6章部分）、田松年（第1章）、李炳勇（第4、6章部分）、李仲如（第7—10章）、张彩云（第11—13章）、孙慧娥（第14章）、钱宏鸣（第15—17章）、李君如（第18章部分、第19—20章）、张勇伟（第18章部分）。全书译文校订：周林东。具体编辑工作由张宁和武市红负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1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蒙太奇	(7)
1. 革命奠基人	(8)
2. 红太阳	(28)
3. “独裁者”	(39)
4. 大立法者	(62)
5. “神话君主”	(83)
6. 象喻的寻求者	(104)
第二部分 思想的转变	(126)
7. 共鸣和影响	(127)
8. 19世纪公羊学说的复兴	(131)
9. 调和的乌托邦主义	(146)
10. 建设和破坏	(171)
第三部分 自由	(189)
11. 新青年	(190)
12. 理性主义	(204)
13. 唯心主义	(224)
第四部分 必然性	(244)
14. 社会主义	(245)
15. 马克思主义	(269)

16. 王阳明：心身平行论的实践传统·····	(292)
17. 王阳明：存在的许诺·····	(313)
第五部分 历史与意志·····	(330)
18. 新黑格尔主义·····	(331)
19. 矛盾·····	(356)
20. 揽月·····	(365)

前 言

象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们一样，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震惊。当消息流传到外界，当《朝日新闻》社记者们开始报道那些大字报，当被捆绑的尸体沿珠江漂流至香港，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一半由于信息不通，一半由于缺乏洞察力，我们对这些纷乱的事实不能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后来，事态渐渐明朗化，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已发现并宣布了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1966年7月，他命令党的书记们亲临北京大学去经受这场文化革命。“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毛对一些在1935年跟随他从江西长征到延安的干部们说，这些在国内战争很久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更有战斗力的革命者。毛宣称：“闹事就是革命。”^{**}

至少对我来说，这类话是意想不到的。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

^{*} 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6年7月22日），见陈志让编：《毛的文章：选集和文献目录》，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6--30页。

^{**} “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第二种版本”（1966年7月21日），见陈《毛的文章》，第33页。

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

也许因为我对毛思想的渊源所知甚少，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诚然，其他学者，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以及本杰明·I·施瓦茨，已经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所有这些“主义”，仍使我感到不满意，不管对它们的具体论述和思考是多么令人敬佩。譬如，斯图尔特·施拉姆精确证明了毛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某种未必代表人类最终命运的东西”）为什么是其思想中某种“辩证法的癖好”的产物。但是，这种癖好首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就象施拉姆所说的，“探索毛思想中辩证法癖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的确，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贯的政治形象的。但是，当解释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时，这样一种描绘就令人困惑不解了。他是一个大胆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用实践的秘诀来解析理论的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象一些人曾谨慎地暗示的那样，他甚至是一个用对抗性矛盾概念来代替阴阳概念的道家辩证论者？

我发现，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可以拒绝认真地对待毛主义。为什么把理论智慧赋予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走向了1949

* 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和继续革命理论》，《中国季刊》第16卷，第225—226页。

年的胜利吗？为什么要由于相信毛的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远非对斯大林理论主张的模仿，就把他的成功的策略和理智的精妙混为一谈？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使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毛毕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甚至在掌握社会主义的词藻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使命。但是，当我愿意承认“战场是〔毛的〕学校”时，我也就假定了自觉的革命行动是靠理论来指导的。那种思想又受到了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一种假设的理论框架的支持。那些假设及其起源往往能被当事人意识到并直接描绘出来，尤其是在当事人理智地反省的时候。但毛通常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已超出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而牵涉到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由于毛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不得不探究到他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所使用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它们构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独特性——只有被放在历史背景中才讲得清楚。不过，简单的对照是不明智的。总体的归纳（“东方人使自己适应自然，西方人反抗自然”）会把超越时间和无历史意义的特性赋予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果没有具体的大众语言来沟通这些文化，那么总体的归纳也就只能依赖于那些一般的特性。

诚然，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任何特殊的民族语言都是一种“不断隐喻的过程。”他曾经写道：“语言既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也是一个收藏人类生活与文明化石的博物馆。”* 因此，毛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

* 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和其它著作》，纽约：国际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111页。

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语言,我们就能开始懂得一些毛主义的基本假设,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外思想融合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中的方式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他们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也具有启迪意义。就一种普遍真理本身的要求来说,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它“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象“毛主义”一样,已经变成一种混合体。

为了揭示这种混合性,本书第一部分由几个片断组成。有些仅与毛本人有关:他害怕革命的倒退,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等等。但更多的篇幅则通过非类推的方法,研究了毛和他的政策,以及其它的政治事例。其中有一些是具体的历史,例如:清代乡约体制,甚至曾经可以在当代中国产生相似的制度;也有的是抽象的概念,例如卢梭的“大立法者”;或者甚至是含有隐喻的,象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因此,这些片断是充满想象力的:首先,透过表面现象可以看到,毛显然是在为他那种政府理论做掩饰;其次,评价毛本人的政治象征,这些象征往往是与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革命形象相适应的。因为毛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神话创造者,他通过讽喻象征的手法来反映人民的追求。

提供这些片断是为了说明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语言。为了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我使用了一种哲学词汇——其原因并不在于我把它看作是其自身的一种先验的语言,而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更鲜明的对比方式。所以,本书以下几部分试图对中西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出一种逻辑一致的阐明。只对政治上的毛主义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内

容比较零散。既然毛及其同僚那样地低估康有为的理论，为什么还要阐述这种理论的演化呢？这里，我认为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尽管毛不了解康有为思想的错综复杂性，但康的关于“仁”的一元论概念，以及他的有关人类史的三阶段的理论，却渗透到了毛泽东那整整一代人的思想之中，粉碎了儒家关系的专制，为更加激进的社会批判形式开辟了道路。康的这种普遍重要性，是我花费如此多篇幅来讨论他的部分原因。

但是，为什么我同时也要详尽地说明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难道仅仅因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自认为是“康德派唯心论者”吗？事实上，毛甚至并不理解康德原著的含义。相反，他只是从弗雷德里希·泡尔生——一位二流的新康德主义者，他仅仅强调康德哲学的某些倾向——的一本书中了解到康德哲学的。如果我们只对毛早年的唯心主义性质感兴趣，那么研究泡尔生的影响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们要追溯到原始的来源？答案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思想只能追究其来龙去脉才能界定。在这里，毛泽东的知识环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是，当我们看到组成这种环境的各个部分因时因地发生变化时，这些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就更加重要了。这不仅向我们显示了“纯粹理性”的力量；同时，它也——用物理学的形象语言来说——建立起了粒子运动的场。譬如，《历史与意志》的基本主张之一是，毛泽东的辩证法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中国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结构并不具有欧洲理性主义的普遍的本体论范畴。直接陈述这样的命题几乎很难表明它是真实的。所以，为了清楚地表达其意义，我通过追溯先验逻辑的发展，而把我对那些范畴的本质的理解告诉给读者。因此，本书有关康德思想的说明，旨在告诉读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面的范畴是多么坚实，而毛主义由于处在